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六四期 ——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10d)

【史海钩沉】	章含之自述：一封密信导致乔冠华晚年悲剧	章立凡
【文革一页】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来龙去脉	王永魁
【当事者言】	警卫员谈江青	姜宝元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章含之自述：一封密信导致乔冠华晚年悲剧

• 章立凡 •

一、事出有因，语焉不详

“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乔冠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外交家，其郁郁以终的结局，曾令许多人感到惋惜。他的第二任夫人章含之女士在《我与乔冠华》和《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两书中的自述，更令这种结局染上了一层凄美的悲剧色彩。才子才女惺惺相惜的爱情、以沫相濡的晚年，读者多为这样的故事感伤不已，笔者亦曾是其中之一。

导致乔冠华晚年悲剧的原委，研究者往往就一些人事关系作出推测，当事人则语焉不详。章含之曾谈及自己被毛泽东点将调入外交部后，未能如愿到新闻司当发言人、且发展一再受阻的人事原因：

后来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当权势、我当时视为朋友的毛泽东的那位远房亲戚所决定。从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摆布之中，直至最后在她和她的亲密伙伴的手掌中毁灭！（1）

从我调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掌握。对于我，她们也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隐约地感到外交部由于有这样的特殊人物，情况比较复杂，恐怕不是久留之地。（2）

书里两位特殊人物，当然是指先于章含之到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她俩本是章的好朋友，但自她进入外交部后，友谊演变成竞争；章嫁给乔冠华之后，更与各种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令关系日趋复杂。关于高层权力斗争，章女士曾谈到“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是为了生存”，并有如下表述：

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合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3）

所谓第一次错误，系指1973年乔冠华反戈一击批判周恩来之事。1975年下半年“批邓”开始以后，乔、章在外交部与两位通天人物的“内战”趋于白热化，又产生了章所说的第二次错误：

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拼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制止在部内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稚，过于天真。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是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泰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4）

究竟如何“与虎谋皮，火中取栗”作“孤注一掷”，又如何被扣上“借刀杀人”的帽子却能“处之泰然”？历史的书写不同于外交辞令，章女士似有难言之隐，其自述又缺乏文献上的证据，令真相显得扑朔迷离。

二、一纸御状，抖出猛料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在“‘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标题下，有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

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活。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专案组还对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语：

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在这个按语下面，还有江青批语的节录文字及影印件：

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会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5）

这本专案材料的编印时间，距“四人帮”被捕仅两个月。康生仍算正面人物，按语保持着“文革”式语言，皆不足怪。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真实目的，以及这两人在历史上是否算叛党，史家尽可继续考证。

三、孤注一掷，满盘皆输

这封“告御状”的信，章女士在上述两书中均未提及。笔者所感兴趣的，则是她写这封信的目的。研读后略作归纳，信中包含了如下要素：

一、事后觉悟到康生通过海容、小唐诬告江青、春桥事件，是邓小平幕后策划，所以要向主席揭发；

二、海容、小唐曾向老乔调查江青、春桥的历史，乔表示完全不知道；

三、我们（乔、章）坚持原则，劝海容、小唐不要替康生传话，章特别指出关于江青的话尤其不能传，因为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

四、小唐对江青有议论（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养老），海容涉嫌有意安排证人吴仲超出席人民大会堂宴会。

这封信似可作为打开乔冠华晚年厄运之谜的一把钥匙。乔在历史上跟随周恩来工作多年，又在1974年随邓小平出访美国；写信时间正值1976年“天安门事件”二十天后，此前康生、周恩来已先后去世，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此信意欲变被动为主动，联系批邓，揭发王、唐，“拼命一搏”；递交后也曾收效一时，令江青对这两位小姐暴跳如雷。

从总体上看，这封信技术含量不高，结局则是满盘皆输的政治自杀。毛泽东对此信的表态及其逝世后“四人帮”的倒台，提前结束了乔冠华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12月2日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对此曾有如下说明：

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这次会议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长职务。现在讲讲为什么免去乔的外交部长。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觉卖身投靠“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明知道主席对“四人帮”有严厉的批评，但他却在外交部当谣言来追查，说这是“政治谣言，分裂中央”。他对毛主席指定华国锋同志担任总理，极为不满。他早就知道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却反对刁难。在批邓中，毛主席认为外交部的运动有问题，让他请示华国锋同志，他不去，他找江青，有意把外交部运动搞乱，要把知道“四人帮”底细的王海蓉（容）、唐闻生同志打成“反革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扫除障碍。毛主席批评乔“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乔同他的夫人章含之反对周总理，把康老揭露张、江的叛徒问题向江青告密，态度恶劣，至今不能取得群众谅解。鉴于外交部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免去）乔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6）

李先念这段定调性质的话，带有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但也透露了若干重要的历史信息，有重新解读的必要。在当时“凡是”思维的主流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对章含之这封以“我们”口吻来信的批评，已足以形成对乔冠华最致命的一击。章女士也谈到：“最终，据说是我那样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乔冠华和我打进了十八层地狱。”（7）

四、卿卿误我？我误卿卿？

“三个女人一台戏”，毛泽东为何要对章含之来信作如此严厉的批评，是对乔章联姻的不满（章女士在书中曾屡次提及）？是对表侄孙女王海容的偏袒？还是在赞同唐闻生的主张？

前两种猜测，目前从文献上无从查证，第三种似略有线索：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8）同年11月12日，毛在江青的一封信上批示，谆谆告诫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9）如此看来，唐闻生关于请第一夫人退出政治活动去养老的说法，固然会令江青恼怒不已，而在毛的眼中或不失为保全之道。

毛泽东有先见之明，江青无自知之明。章含之的政治眼光和手段，则远逊养父孤桐老人（据

说章士钊生前并不看好“准姑爷”)。乔冠华是折冲樽俎的国际外交风云人物，却在纵横捭阖的国内政坛中一败涂地。章女士亦曾自叹：“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备参与政治斗争的种种手段，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冠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0〕

1983年乔冠华逝世时，由于章含之不同意将乔在“文革”中的错误写入讣告，报纸只发了简短的消息，没有介绍其生平和发表评价。2006年元旦，她在接受采访时爆出新料，指出正是“你办事，我放心”这张字条，给她们夫妇带来了厄运：

……1976年某日，华国锋觐见毛主席。华谈到批邓工作，认为现在的一些做法不够好，并谈了一些新设想。于是当时已经口齿不清的毛写了个字条，上面是：“你办事，我放心。”华从毛主席那儿出来，碰见乔冠华，给乔看了条子。乔问什么意思，华就说了他请示批邓并得到毛的允诺。乔表示理解，并没放在心上。

而后来，天下人都知道了这张条子——那成了毛让华接他班的诏令了。而却有一个人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条子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这个人，他能活吗？〔11〕

章女士披露这段掌故有点迟，目前尚属口述孤证。上述字条的背景和真实意思，直接关系到一段重要历史的诠释，有待史家进一步辨析考证。

乔、章夫妇在“四人帮”倒台后堕入“十八层地狱”，究竟是由于毛泽东对章含之来信的批示，还是因为伟大领袖写给接班人的字条？至此，章女士已先后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厄运成因说。

对于远去的历史和人物，今天理应有更多的客观与宽容。乔、章之恋的根本不幸在于：男女主人公身陷一个过分政治化的时代夹缝，这场轰轰烈烈的风花雪月之爱，注定要缘于政治，博于政治，毁于政治。

有人说“乔老爷”毁于“两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女士则屡屡提及：“因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12〕

权力往往令人愚蠢，爱情似乎也未必能使人聪明。究竟是卿卿误我，还是我误卿卿？

注释：

〔1〕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2〕同上，第259页。

〔3〕章含之等：《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页。

〔4〕同上，第65—66页。

〔5〕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第48—49页。

〔6〕《李先念陈云谭震林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2月2日。

〔7〕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73页。

〔8〕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和批语（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9〕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同上，第394页。

〔10〕章含之等：《我与乔冠华》，第66页。

〔11〕刘天时：《外交官章含之》，《南方人物周刊》第44期。

〔12〕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127页。

□ 摘自“人民网”

~~~~~  
【文革一页】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来龙去脉

• 王永魁 •

◇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的背景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的弦又开始逐渐绷紧。1963年5月，《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新编昆曲《李慧娘》和繁星（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此开始了在报刊上一系列的公开点名批判的风潮。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毛泽东的批评，表达了他对文化界的不满。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把《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批给了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刘仁，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中的第一个批示。

彭真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意识到这个批示不同寻常。18日，彭真将毛泽东的批示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成员以及经常列席会议的同志，并建议由刘少奇在1964年元旦左右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贯彻毛泽东的批示。

1964—1月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有中央宣传部和文艺界有关人士3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工作的状况，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周扬认为文艺界的问题是坚持毛泽东的文艺方向不够，“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认识问题”。彭真在发言中首先做了检讨，他说：“主席这个信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主席为什么写这个信？他就是觉得北京这个文艺队伍是相当的鸦鸦乌。”彭真指出了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后，表示应该为文艺界分担责任。又提出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只要为社会主义、为工农兵服务就好。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当前文艺战线要抓三件事：一、统一认识。要正确估计形势，明确方向。二、拟定规划。积极提倡演现代戏。三、加强写作队伍。”刘少奇肯定了周扬的发言后提出：“文艺界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著作，努力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文艺界也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会后，有两位参加者向中央宣传部领导写信，指责这次晚会“着重的是吃喝玩乐，部分演出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收到信后，中央宣传部领导召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认为这件事“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因此决定在文联及各协会全体干

部中开展一次整风学习。整风学习告一段落时，5月8日，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报告尚未定稿，江青就说她个人要看，把报告草稿要走，抢先送给了毛泽东。6月27日，毛泽东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中的第二个批示。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按照计划，彭真要在大会上讲话。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比第一个批示的措辞更严厉，彭真在讲话中既要体现毛泽东的意图，又不愿违背党一贯的文艺政策，因此讲话出现了既严厉又不失温和的语气：“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怎么能够允许京剧这么一种重要的剧种，艺术水准比较高的一种剧种，我们艺术上一项重要的遗产，老这样帝王将相的演下去？继续演那些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東西？那不行。那样，客观上就是帮助封建势力进行封建主义复辟活动，帮助资本主义势力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不要以为我们这里不会出修正主义。如果不好好抓阶级斗争，抓社会主义教育，也可能出修正主义。老实讲，文艺界的问题是相当多的，绝不比其他方面少。所以，在文艺战线方面，要进行整风，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大家要好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自己检查清理一下过去几年自己写了些什么作品，演了些什么戏，拍了些什么电影，唱了些什么歌子，奏了些什么音乐，画了些什么画，有哪些作品，哪些东西，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带有资产阶级残余影响的，或者是封建主义的。发现错误、缺点，改掉就好了！文艺界都要这样做，京剧界也不例外。”毛泽东认为彭真的讲话“讲得很好”。

#### ◇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后的工作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1964年7月初，“在毛主席那里召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同志和康生参加。毛主席批评了文化部的工作，也批评了中央宣传部和周扬同志，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并指定由陆定一、彭真、周扬同志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由陆定一同志主持。陆定一同志当场以‘见事迟’为由，表示不宜由他主持，建议彭真同志挂帅。彭真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毛主席也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康生也谈到了文化部的事情，毛主席接着要康生和吴冷西同志也参加小组工作。”这个小组一共五个人，称为“五人小组”。当时陆定一的想法是：“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大都可以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而当时的批判并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而是打棍子、扣帽子，我不知道这个‘文化革命’要怎么革法，心里没底，我没有接受这个任务，推荐彭真同志担任组长，我任副组长。”

7月7日，彭真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第380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怎样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彭真传达说：“毛主席最近抓了文艺、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认为文艺界‘很混乱’，最近又批评有些协会已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发展下去势必要搞‘裴多菲俱乐部’；文化部不执行党的政策，不为工农兵服务，可改为帝王将相部，鸳鸯蝴蝶部，为什么不可以解散？甚至说，我想把地方搞起来，革中央的命。”“还有学术界，首先是哲学，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李秀成的问题也要讨论，还有高薪问题。有些大知识分子入了党，宇宙观如何？入党太容易，共产党成了全民党。”会议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指示。

“五人小组”的成员都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在毛泽东做出“两个批示”的形势下，他们也是批评的对象。毛泽东提议他们组成这个领导小组，或许有更深层次的考虑。9月11

日，彭真主持“五人小组”会议，讨论部署文艺界和学术界的整风问题。

9月23日，彭真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五人小组”召集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座谈会，讨论研究怎样领导整风的问题。彭真在讲话中首先谈了自己的认识并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12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批评，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半年内对意识形态的革命大喝几声。所以，我请少奇同志主持开了会，还攻了一下京剧演现代戏这一关。关于整风问题，彭真提出：第一，先整党内。整个文化战线上的党员同志，都要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有错误，赶快改。第二，党内怎么搞法：不是把人一棍子打死。毛主席指示说：还是要进行教育。多数人是好的，或者是可以改好的，要准许人家革命。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第三，从何入手？从作品搞起。在一篇作品里，问题多得很，着重搞大是大非，就是两条道路、两个主义、两条路线，为工农兵还是为资产阶级。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区别敌我性质和人民内部问题，错误是比较系统的、一贯的，还是偶然的、个别的。人民内部问题还是采取整风的形式。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总体来说，要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两种办法：一是自觉地学习毛泽东著作，破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立无产阶级思想；二是大家帮助。灭资产阶级思想需要有个过程，要经过痛苦的过程，要和风细雨，小会批判，不搞大会斗争。会议从下午三点一直开到晚上九点。陆定一和周扬都讲了话。江青也参加了会议。

1965年2月17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召开“五人小组”会议，研究文化部门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彭真在讲话中强调：要以中央《二十三条》的精神统一认识，明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总结经验。针对1964年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問題，彭真说：北大工作队也要总结经验，研究今后怎么做；不要盯在过去的一些事情上，紧张空气要放松一下。会后，陆定一即向北大工作队作了传达。但是，北大工作队并未积极贯彻执行“五人小组”的意见，致使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迟迟不能得出结论。4月2日，陆定一代表“五人小组”宣布撤销原工作队主要领导人的职务，重新设立了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1965年3月3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召开第393次会议，听取陆定一关于半年来文化界和思想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的情况汇报。彭真说：现在看，这一时期的文艺批判有很大成绩，很见效，理论上也把一些代表人物做了批判。但也有些问题，搞得人家不大敢写文章、写剧本了，连新华总社有一阵一天只来四五篇稿子，这个现象值得我们警惕。学术问题，错了允许讨论。要注意有些人不是研究学问，靠攻别人找岔子出名。多数在学术争论中有错的人，要他们自己清理，不要随便展开批判。小是小非在小组里去处理，不要搞得大家都灰溜溜的。学术界也是这样，人家过去讲得不对的允许改正，批评要同志式、友谊式的，不是一棍子打死别人，使自己一举成名。邓小平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戏台上只演兵，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齐燕铭的副部长、党组书记，夏衍的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职务，调萧望东为文化部第一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石西民为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文化部的改组，是毛泽东几年来对文化部工作不满，文化界整风的结果，同时也是意识形态领域过火批判的结果。这次改组，从“实践”上论证了“完成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 ◇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困境

从“五人小组”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上半年的工作来看，是与当时日益严重的文化批判不大协调的。虽然“五人小组”也直接参与领导了一些批判，比如彭真于1964年



7月16日审阅同意发表《关于“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同时批送吴冷西：“要赶快组织人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并准备一系列的文章，直到大体的结论（先设想个大纲，随着争论发展充实），因为学术理论问题的争论文章靠临时赶不行。请准备。”但是总的来看，还是试图把这些批判控制在一定领域，把批判的温度降下来，使批判限定在学术范围。

萧望东调任文化部第一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后，着手起草了《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虽然也对文化界的情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但仍然认为：“总的说来，当前文化战线上的形势，同其他战线一样，也是大好的。事实证明，关键在于领导，这支队伍的绝大多数人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1965年7月13日，萧望东将这个《汇报提纲》向“五人小组”做了汇报，得到彭真、陆定一等人的肯定。9月6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周扬和萧望东的汇报，肯定了这个《汇报提纲》。10月30日，这个《汇报提纲》正式上报中共中央。196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1965年9月，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已经被批判的夏衍、阳翰笙还是被请上了主席台就座。彭真在会上讲话指出：文化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领导责任主要是中央没有及时地抓，没有坚持地系统地加以解决，书记处要负责。从文艺、学术工作来说，很多人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没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上层建筑要为基础服务的原则。彭真还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还有好多关于这方面的讲话，“但是我讲了就算了，放了空炮”，“负责的第一位是我”。彭真强调说：“不要把文艺战线看作漆黑一团，主席批示指的是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及其刊物，而不是指的整个文艺战线。”“学术、艺术问题中，有同历史发展方向对立的政治问题的，应该联系政治问题对待；不是政治问题的，就不要轻率地把它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特别是同敌我问题混淆起来，也不要轻率地下结论。”“现在有些批判就是立的这个方面少了，把错误的批判了，但是怎么立、立什么呢？看不出来。我们的批判，总的来讲，不应该这样。”“党内也好，人民内部也好，不论你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文艺工作者、普通老百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地方只能服从真理。”周扬也在会上对那些遭到批判的人说：“不要老是想到我挨了批评，批评得多一点，少一点……批评得过重或是不够，总是有的”。

彭真用传达毛泽东谈话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替当时被过火批判的文化界人士承担了责任，对当时以政治上纲代替学术研究，以轻率否定代替深入分析的倾向做出了批评，试图把政治批判引上说理讨论的轨道。彭真关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论述，实际上是对当时只许批评不许反批评、几乎一边倒的批判的抗议，代表了被错误批判的文化界人士的心声。

尽管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一线领导集体对“五人小组”的工作有诸多肯定，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实际上，毛泽东没有表态也是一种表态，即对“五人小组”的工作并不满意，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支持，至少是允许江青等人甩开“五人小组”另搞一套。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组织人写批判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1965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赴京开会时就带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修改稿，送给了江青。毛泽东在会上问彭真：“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据陈丕显回忆，“我和魏文伯（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作者注）对视了一下，心照不宣，知道主席肯定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了，并且是同意批《海瑞罢官》的。”

1965年9月，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试图使批判降温；同样是在这个时间，毛泽东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试图使批判升温。“五人小组”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无法领会毛泽东

的精神，自然也无法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时提到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说：“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从这些话可以看出，至少从组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起，毛泽东就对“五人小组”已经持不信任态度。

“五人小组”成立时的任务是“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指示”，但是当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与毛泽东在对形势的估计上产生分歧之后，“五人小组”从党的一贯政策出发，贯彻中共中央一线领导的意图相对更积极一些，招致毛泽东的不信任也就是必然的了。这也注定了“五人小组”的最终命运。

#### ◇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最终命运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全国文化批判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解放军报》转载时在按语中明确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认为《海瑞罢官》的出现，“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对《海瑞罢官》的问题，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的看法与毛泽东的看法有着明显的距离。虽然在彭真的主持下，北京市委也组织了一些批判吴晗的文章，但调子明显比姚文元文章温和得多，角度也选择在学术范围。这显然与毛泽东认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其中说道：《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相去甚远，以致后来被认为是“假批判”。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势头，把“五人小组”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们必须尽快做出决断。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委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听取了胡绳对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的传达（没有传达“要害是罢官”这句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话），围绕批判《海瑞罢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彭真说：现在思想界正在开展一场大争论，现在的问题是要展开，把各种不同观点放出来，政治结论可以放后一些。《解放军报》的按语讲《海瑞罢官》是大毒草，是对的，但是这么一讲，就使人家不敢讲话了。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这时周扬插话说：《解放日报》推荐《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语的。彭真接着说：对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陆定一在会上说：当前的讨论实际上是一次大争论，争论的重点归纳在思想范畴内比较好。在方法上，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康生发言说：吴晗的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自我批准”、“自我开脱”，现在他自己扯出来了，它的要害是罢官。从这些发言可以看出，“五人小组”里面，只有康生明白毛泽东的想法。

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五人小组”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因病缺席），还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共11人。会议讨论了当时学术批判的形势、性质、方针和队伍等问题。彭真在会上指出：已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与彭德怀也没有联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彭真的

讲话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的“要害是‘罢官’”的说法。会后由许立群、姚溱执笔写成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提纲》指出：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所展开的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斗争是长期、复杂和艰巨的，不是靠“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判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以完成任务的。《提纲》还提出：领导运动要坚持毛泽东1957年3月在全国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提倡的“放”的方针；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不要不准革命；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等。

2月5日，彭真代表“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当前学术讨论的情况和问题。刘少奇主持会议，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因病缺席），以及许立群、胡绳等11人。会上，彭真对《提纲》作简要说明后，由主要起草人许立群汇报情况。会议同意《二月提纲》，决定由彭真等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会议同意“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组成，以许立群为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可见，当时的中央一线领导和“五人小组”是希望学术批判有统一的领导，规范起来，但这显然不符合毛泽东的意愿。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及许立群、胡绳等乘专机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二月提纲》。毛泽东对《二月提纲》没有立刻表示不同意见，但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彭真回答：吴晗当然有政治错误，但和彭德怀没有牵连。毛泽东说：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毛泽东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可以解决的。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彭真就以为毛泽东同意了《二月提纲》，于是，许立群按照彭真的意见代中共中央起草了通知，彭真做了最后改定，陆定一和康生都在文件上画了圈。2月13日，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圈阅文件后，中央办公厅将中共中央的通知和《二月提纲》下发。

毛泽东实际上是不同意《二月提纲》的，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此后，形势急转直下。

4月9日至12日，康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

□ 《百年潮》2014年第3期

~~~~~

【当事者言】

警卫员谈江青

• 姜宝元 •

姜宝元：1973年6月至1975年12月为江青警卫员

采访者：李宇锋

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姜老，今天请您来，想请您谈谈您给江青做警卫员时的一些事情。

姜宝元（以下简称姜）：可以说，我是糊里糊涂地当了江青的警卫员。1973年6月11日夜里，我在钓鱼台二科警卫值班室值班，接到汪东兴秘书孙守明的电话，让我赶紧找个人替我值班，说李子元的车很快到钓鱼台15号楼来接我，也不让我问去哪儿。我就在楼门口等着，李子元的车过来后，直接把我拉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当时叫向阳厅）总理那儿。

我不知道什么事，李子元也不吭气。当时江青正在和总理谈话，让我在外面稍等一下。后来总理和江青从里面出来，我也不敢主动说话。总理说：“你是小姜吧？你是哪儿的人啊？”我说我是山东黄县人。总理说：“你把江青同志接到钓鱼台去，江青同志的警卫工作你就负责了，你就照顾江青同志上车吧！”就这样简单地说了几句。江青原来的警卫员周金铭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敢问。我小声跟总理说：“不行呀，我没干过啊！”总理说：“在实践中学嘛，做好江青同志的警卫工作，啊！”

李：这是你私下跟总理说的吗？

姜：我一看不好就赶紧问总理，我当时心里特别害怕。因为都知道江青非常厉害，没有不训的人，没有不发火的，我们在外面不时听到一些说法，所以都害怕。

从总理那儿把江青接上，一路上我都不敢吭声，连喘气都小心着点。到了钓鱼台东门外，她告诉李子元：过了桥我要散步。进东门下车时，我知道开车门时不能大声，便慢慢地打开车门，然后用手护着她的头，小心地把她扶下来，然后轻轻地推上车门，她就问：“什么风啊？”我真不知道，就说好像风不大，她说：“不能说风不大，有一点儿风都很厉害地吹人，我最怕贼风。”我就跟着她散步。走到15号楼门前拐弯处，江青开始给我上课：“你知道你担负的任务是多么重要吗？我这个人专门掌握国际动态的，每天给主席送好多材料，供主席参考。”接着又强调道，“你给我当警卫员，知道你担负的任务多重吗？”

杨银禄：（以下简称杨）：你不敢笑是吧？

姜：不敢笑，因为她挺严肃的。我说：“我没有经验，没干过警卫员工作。”“不要紧，我这个人比较随和，没有很多事，你就把你的事办好就行了，护士有护士的事，秘书有秘书的事，你就把你的事做好，我每天都要到院里散步，散步前你出来给我看看风。”我对她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好，请您随时批评。”她把眼一瞪，我不敢吭声了，就扶着她进了楼。

杨：那天你睡哪儿了？

姜：我就睡在大周（周金铭）屋里。实在睡不着，就坐了一会儿，等天一亮我就出去找人。找到王振荣，他是江青楼的警卫战士，专门在大楼门口值班。他跟我说：“杨秘书和大周因为联系看电影的事，让首长发火了。”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时安排刘真暂时担任杨秘书的工作，我替大周担任警卫员。

李：有没有组织上的人正式找你谈话，交代担任江青警卫员的注意事项什么的？

姜：没有。

李：没有正式组织跟你谈话，你就担任了江青的警卫员？

姜：总理交给的任务呀。

杨：总理怎么认识你？应该是有人推荐。

姜：不知道。好像是有人推荐，我估计是老邬（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推荐的。可能是江青到了总理那儿，总理打电话给汪东兴，汪东兴打电话给邬吉成，老邬定的人，然后又报告孙守明，又报告汪主任，汪主任又报告总理，最后才定的让我去。但这都是推测，我那天接到电话是很突然的。

李：这是第一天，王振荣给你介绍了一些情况，然后呢？

姜：然后就按部就班。凡是江青的警卫工作，出门、开会、散步、看电影、打扑克都是我陪着。她一出门我就跟着，一步也不能离开，一进她住的楼我就不管了，有秘书和护士。从1973年6月12日，一直到1975年底，一年半多的时间。

李：这一年半里，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姜：压力大，压力太大。

李：为什么？

姜：主要是他们（指工作人员）老前辈的下场给我深刻的教训。在江青那里，只要有一点点不高兴，她就会想“他（她）一定对我有什么看法”。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以及因为工作关系知道江青、了解江青的人心里都害怕。我们后面去的人都看前面的情况，不是进监狱，就是去“五七”干校，这些都是老前辈的脚印，我们去接他们的班，心理压力非常大。

另外，江青总是打主席的旗号，在当时的年代，对主席的崇拜空前高涨，人们尊重毛主席所以对她也很尊重。连总理都说是看毛主席的面子。其实，江青当时要见主席也是要请示的，主席同意了 she 才能去。我记得有天晚上她说要见主席，主席那里一会儿来电话说“今天不见客”，江青又回电话说：“我不是客，我要见他。”主席处又来电话说：“今天任何人都不见。”她就老老实实地待在钓鱼台。

阎长贵（以下简称阎）：“文革”以前，陶铸夫人曾志说江青到广州去，看文件等是政治局委员待遇。九大上，江青真的成了政治局委员，然而她作为毛主席夫人的身份比政治局委员还重要。比如，她去海南玩，叫同样是政治局委员的吴法宪陪着，她到青岛玩，叫同样是政治局委员的吴法宪、李作鹏两个人陪着。老杨，是这样吗？

杨：一点儿不假。

姜：所以这也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关。那时候毛主席是全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人民对他无限热爱、无限崇拜，在当时你敢对江青怎么样？在江青身边你敢侍候不好她，一旦她不高兴了，这一辈子就翻不过来身。人们生活在一起，经常见面，不可能没有什么矛盾。在江青身边时间长了，她总会挑你一些毛病，所以你就感到紧张。在她那里如果出了问题，无论回到部队

还是地方，人家都会说，“这人是在江青那里犯错误了”。这帽子无形之中给你戴上了，再也摘不下来了。所以到了她那儿以后心里非常紧张，觉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精神疲劳。

李：除了江青本人的地位、身份以及前任警卫人员的下场以外，还有什么因素给您造成了如此大的压力？

姜：江青的疑心。她疑心特别大。有一次江青到天津，住在迎宾馆。她说坐车坐累了，想打打桥牌。3号楼一个服务员，见到江青特别热情。江青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啊，在哪儿工作呀？”那个服务员回答以后，又说：“首长啊，我见了你感到很亲切，就像见长辈一样。你住我们这里我非常非常高兴。”江青问：“你们这个楼谁住过？”她说：“3号楼陈伯达住过。他晚上不睡觉就看片子，什么片子都有，外国的，中国的，还有床上的镜头，看了好多电影，几乎每天晚上都看……”江青就不高兴了。我对服务员说，你赶紧走吧。服务员一看她生气了，吓得赶紧走了。那次江青没住可以放电影、打牌的3号楼，住的是主席住的1号楼。江青告诉当时的负责人说：“把这个人赶紧给我弄走！她是个特务，探察首长活动动向，这个人不能在这个宾馆里，这么严肃的场所她怎么能在这儿呢？把陈伯达的事到处说，我的事她也会到处去说。立即调走！去劳动改造。”后来这个负责人向汪主任打电话请示，汪主任心里有数，他说你们根据情况，江青在这住的时候，不要叫这个服务员再露面了。以后就把她调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干后勤，没处理。

由此吸取一个什么教训呢？就是说话得把握分寸。在江青面前你不该说的话千万别说。我们当时也这样，她问到什么就说什么，不能什么都说，她不是光听你的汇报，有时候你说的话她会转个弯去想到别的。

李：江青对警卫工作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比如她给没给你提出什么特殊的条件？

姜：江青的警卫工作是按照副总理，即二级的级别来部署的。二级包括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这些职务。她参加会议和活动时，除了自己的车外，还有随车，随车有武装，去现场（比如到市里哪个公园）前，先通知市公安局去人，布好现场警卫，包括制高点的控制，然后她才去；坐火车外出的话，挂一节高级包厢，叫公务车。

杨：江青不是，她是专列，我跟她出去好几次，都是坐的专列。到八达岭、青岛、上海都是专列。她坐火车行动，就是一级警卫了。

姜：江青说要到大寨去，我们报告汪主任，调专列还是调飞机，汪主任给她安排。我在的期间，她很少坐飞机。

杨：我在的时候她常坐飞机，到上海、广东、青岛都是坐飞机。

姜：因为主席有交代“我家里一切的事由东兴同志负责”，我们都是报告汪主任，汪主任安排，包括通知外地，安排警卫工作、随车等。

李：江青对你有没有提出什么特殊的警卫要求？

姜：江青本人一般不管这些事，跟我没提过类似要求。但我知道她向中央提过一次要求。主席去世以后，江青突然提出要坐保险车（防弹车），一般她都坐普通红旗，政治局一级的都坐普通红旗。后来她到清华大学200号基地去搞调查研究，到昌平一带摘苹果，都坐的是保险

车。那时候我已经不是她的警卫员了，只跟随车。警卫员大周在她身边，她让司机加油快跑，从昌平到北京车速飞快。当时我有点纳闷，感觉有点反常。

李：在担任江青警卫员时期有没有遇到紧急情况？

姜：没有，因为我们是最后一道防卫，我们内部都很安全。警卫工作都是提前布置好，中央的领导才到现场，如果没布置好，我们原则上不同意首长到现场。警卫工作是七分保密，三分警卫，所以要提前把工作做好，而且要绝对保密。外出都提前准备好了，该清场的清场，人员该审查的审查，这些工作都提前做好，我们跟着她进去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再出问题，那就完了。

李：按一般人的想象，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不管是国外的间谍、国内的特务预谋的暗杀，还是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报复”，甚至党内政敌的“阴谋诡计”，江青肯定算“重量级目标”啊！她自己不也老说这个特务那个是监视她的吗？当时所有这些“敌对势力”，从这个角度，听没听说过有没有谁试图威胁过她的生命安全？

姜：我没有听说过。

李：你从来没听说国外的某个间谍机构、国民党派人谋害江青？

姜：没有。江青主要在国内活动，范围很小，不到国际上去活动，她主要就是钓鱼台、大会堂、中南海、京西宾馆，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李：当时要防范的对象是拦车告状，还有人就想上车跟首长握个手，照个相，这种情况有吗？

姜：拦车告状没有，我在当警卫员时，江青没有遇到，但是突然出来与她握手的情况遇到过。她到外面见群众，人都特别多，有一次在首都体育馆开大会，江青在过道走，有一个人挺激动的，突然出来要和江青握手，当时别人就把他拉开了。

李：江青本人对这种事是什么态度？

姜：那天拉开那人，江青问那人干什么的，我说：“没看清，咱们赶紧走吧，别有什么事。”她就走了。

阎：关于群众拦江青的车的事我倒遇到过两次。那都是在“文革”初期。1967年4月中旬，警卫员孙立志因检查出肝炎离开了，警卫局换了一个姓杨的同志给江青当警卫员，只一天时间，江青就不满意，对我说：“我怕见生人，你代几天警卫员吧！”我说：“我一天兵没当过，没有一点儿警卫知识啊。”江青说：“当警卫员不就是跟我出去嘛！”我不能拒绝，就当了一个月的警卫员。其间，有一次从钓鱼台去中南海，走到府右街中南海北边西门口的时候，忘记是一个男的还是一个女的，就趴在江青车上了，可能上访什么的。

李：当时可能是要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

阎：当时路线警卫马上把这个人拉开了。这是一次。

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有规定，不准开车门，不准下车，能走赶紧走。

阎：再一次就是1967年4月20日，那天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日子。下午开会以后，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去看郭沫若，因为郭老的儿子自杀了。车队走到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附近，群众很多，要见首长，都拥到江青车前面了，总理跟江青坐一个车，他对我说，你下去看看轧没轧到人。江青没表态，我坐在前面，下车方便，就下车了。外面是警卫局的人，跟我说：“警卫员是不能离开首长的，你不能下来！”我不知道这条，说是总理让我下来的。当时陈伯达也从他的车上下来了，后来我和陈伯达一起坐车赶到郭老家。

姜：就是碰到人也得赶紧走，事情有后面的人处理。

李：这就是内行和外行的区别。你做江青警卫员之前，她认识你吗？

姜：认识，因为我跟着她出过几次差。一开始不是我，是高秀臣。有一次，在北戴河碣石山看日出，江青要上几个台阶，高秀臣就往上架她，劲太大了，把江青弄疼了，她火了，“你弄得我这么疼！”江青再去出差时，二处又选高秀臣去，江青绝对不要，说：“这个人不能用，心眼太狠，对人太狠，我这么重要的一个人，还这样对待我，对待别人可想而知了，必须立即调走，不要。”这样高秀臣就复员，回到山东去了。

阎：江青还是有话语权的。

姜：谁也不敢呛她的茬。但她也不是一天到晚都那么“厉害”。有一天她吃完饭，问我：“姜宝元，你来，你学过武打吗？”我说学过，我们部队都练。她问练的什么拳？我说练的是擒敌拳。她说你会吗？我说我会啊，我练过好几年呢。我问她你想看吗？我练给你看看。就在她的大厅里噼里啪啦地打起来了。她说：“哎哟，练得还行啊！”笑了笑。江青也不是光环，她高兴的时候也挺好的。而且江青非常聪明，看东西，反应问题特别灵敏。

阎：毛主席“文革”前就讲她看问题尖锐。

姜：江青在九大当上政治局委员后，没有分配她具体工作，江青在主席面前抱怨，我现在是个闲人，没有工作。主席说：“不能说你没有工作，你是观察掌管国内外的动态，这不是大工作嘛。”

有一年，她看到《大众日报》登了一个消息，南方的龙井茶树在沂蒙山区安家落户了。她一看就高兴得不得了，就给汪东兴打电话，从浙江选了六棵大茶树，栽到钓鱼台的大草坪里，说要解决钓鱼台、中南海和大会堂开会时领导人喝茶的问题，还调了几个茶农转到我们警卫团当兵。结果今天死几个枝，明天死几个枝，她一看不好就搭起一个棚子，挡风避寒，也不行，后来又运回去了，茶农也回去了。

李：江青对武则天评价很高？

姜：是，江青还跟我们讲过武则天，说男女要平等，我们新社会现在还有不平等现象。她说，中国妇女向来是最底层的，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还受男人的压迫。古代那些帝王将相一个人霸占了那么多妇女，男人逛妓院，找情人，一点儿错误没有，女人一出格就不得了，这是对妇女的压迫。她对武则天是很佩服的。在她眼里，中国妇女最杰出的人物就是武则天，她说：“慈禧太后虽然掌握政权，但是她没称帝，唯独武则天称帝。”

阎：谭震林在1967年2月17日给林彪的信中写道：江青比武则天还凶。当时毛主席对这句话有什么反应，现在还不知道。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要是武则天就好了。”后来李讷跟江青吵架，说：“你想当武则天啊，你还没那个本事。”还说：“武则天还有两个人支持，谁支持你啊？”

阎：毛主席深知江青没有武则天的本事。

姜：关键是主席卡得很严。主席说过：“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我了解江青。”

李：你能谈谈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吗？

姜：对这个问题我谈谈我看到的几件事情。1974年，有一次江青到小靳庄见群众，王曼恬（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陪同。江青说：“小靳庄是我抓的点，我通过你们把经验在全国推广。要批林，批孔，批周公。”该村有个妇女姓周，叫什么名字忘记了，江青说：“你不要叫这个名字了，我给你改个字，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暗示克周总理。

李：当时正值批林批孔。那时候从你的角度观察，江青有什么反常表现吗？

姜：江青表面上很平静，实际上忙着“放火烧荒”，派老邬等几个人到处送材料，所谓送材料就是“点火”。我做警卫员期间，除了那次在小靳庄她说“用咱这个周克他那个周”，她没有在公开的群众场合点过总理的名。

李：1973年年底政治局开会就开始批总理。当时你们周围议论不议论批总理的事情？她情绪上有什么变化？

姜：里面的事就不知道了，会场我进不去。她情绪上比较兴奋，有时候吃了安眠药进去睡觉了，我们心想这下也该休息休息了。谁知她一会儿又打铃，要找这个文件，那个文件，查材料，又打电话给“梁效”（指北大、清华两个学校写作班子的笔名）的头，具体内容不知道，我看到的只是现象。

李：总理后来去江青那里多吗？

姜：不多，身体也不行了。总理1973年在305医院动的手术，基本上没有活动了。1976年1月8日总理去世，听到消息以后，天不亮，江青赶紧就坐车去看总理，那时候总理瘦得不像样子了，大胡子，满脸都是老年斑。那时候大周已经回到江青身边了，我是随车警卫。

李：在你当警卫员的时候江青去医院看过总理吗？

姜：去过。305医院后面有专门的一栋房子，我们没进去。江青自己进去的，总理在里面接见她，我们在车库里等着，时间也不长，有半个小时。总理只要身体允许，都坚持送她到车库，我们有时候能见他一面。

李：江青平时见其他领导人多吗？见他们之前，从你工作这个角度，有没有安全警卫方面的要求，比如不能带什么？

姜：原来有要求不能带什么，但是比较熟悉的，比如浩亮、刘庆棠、于会泳，就没那么严

格。这些人见江青有一条，不在她住的10号楼见，都在17号楼，那是看电影和活动的地方。

李：来见的人还有谁？

姜：文化组的就这些，还有王海容、唐闻生、毛远新。谢静宜、迟群也见过，不多。王洪文一般也很少去江青住的楼，张春桥、姚文元去得多些。

李：除了这些人，其他像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来得多吗？

姜：不叫不来。吴桂贤也不敢去，其实吴桂贤住在11号楼（江青1967—1968年住的楼），江青住在10号楼。为什么吴桂贤住在11号楼呢？因为她丈夫来了，领着孩子。有一次两个孩子在11号楼后面的小树林那玩耍，江青正好出来散步，经过11号楼门口要拐过去。她一看到，就说：“这是谁的孩子，怎么钓鱼台有孩子呀？”我就告诉她这是吴桂贤的家属，“哎呀，钓鱼台怎么能住家属呢？”她直接到11号楼，正好吴桂贤也在家，服务员报告，吴桂贤慌慌张张从楼上下来，“江青同志来了，你到客厅坐一会儿吧！”江青张口就说：“钓鱼台是党中央办公的地方，中央负责同志活动的场所，不能住家属和孩子。”吴桂贤说不上话了：“是组织上面安排住这儿的，不是我要求住在这儿的。”“不行，这个地方不能住家属和孩子。”江青谈完话以后，吴桂贤很快就把孩子和家属弄到京西宾馆去了。

李：江青那段见没见过她的亲戚？

姜：没有，据说她有个姐姐，叫李云露，我从来没见过。

李：那时候她见的家里人比较多的大概就是毛远新了吧？

姜：那是“文革”后期了，毛远新当主席联络员，而且还在10号楼住过，一开始王海容和唐闻生去得比较多，后来毛远新来了，就代替她们两个了，有什么事他经常到江青那里。

李：江青实际上平时生活中接触的人很少是吧？

姜：很少。因为她本身不能见生人，有事我叫你来可以，有事你找我不行，她总说，“有总理嘛，有小平嘛。”再者她管的范围比较小，她曾经说过：“我这几年给主席观察国际国内的动态，看大参考。”有时候一天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拿大红笔划，划完以后通过机要交通送到主席那儿，然后就打电话给张玉凤：“这个一定要给主席看啊。”有时候她问：“给主席提供的消息，主席看了没有？”张玉凤来电话说：“主席圈阅了。”“没说别的吧？”“没说。”

李：我听说江青的警卫员有一个工作就是陪她散步，她对散步有什么要求？

姜：江青一般是上午九十点钟起床，起来以后喝点儿麦片，吃点儿小点心，然后看一会儿文件，大概半个小时，就要出去。你要提前一个小时在门口等，等之前要去楼外面转一圈，看看什么风向，看好了以后，就坐着等。她出来你先递围巾，给她围好，她两手支开，你从后面给她穿上大衣，先是右手，再是左手，整理好领子，动作要轻，出门前再给她帽子。然后她问你是什么风，西北风就往东南走，走到路口。钓鱼台的风它是受周围楼房和树木的影响，经常刮转风，本来是西北风，走到11号楼，风又转回来了，迎面来了，这下坏了。她火了：“你没有出去提前看风向，你连个风向都掌握不准。”有一次正好赶上她不高兴，“你这是对工作不负责任，是软刀子杀人，杀人不见血，你起到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对我的伤害就是对党的伤害，你知道吗？”这时候你不能吭声，低着头就行了。如果你说“我确实看风了”。她更火：“你敢

跟我顶嘴，你什么东西！”说的话特别难听。

李：她跟你发火多吗，都是因为什么啊？

姜：不多，有几次。都是她不高兴。她打铃，一下是秘书，二下是护士，三下是警卫员。我刚来的时候，有一次打了三下，我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进办公室见她，进去了我就站在那。“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我还得抬头，蹲下，蹲下。”没办法，我就一条腿跪着一条腿那样半蹲着，她说：“你以后见我就这样见。”我说话声音一向比较高，她说：“你不能这样跟我嚷嚷。”“你第一次来，我原谅你，以后你想着，走路要轻，动作不要带风。”她把脚翘在小凳子上，你站着说话她让你蹲下，她不能往上看，她要平视。如果你违背了这个要求，她就发火了。我第一次就遇到这样的事，因为没人跟我交代。然后她吩咐我联系什么事，我就到外面去联系。

有时候她急着要走，我说不行，那时候怕出事，一旦出事不好交代。我就说你等等我去打个电话，她一听打电话就怀疑，我就解释我打电话叫他们市公安局做做工作，因为你去是比较重要的人物，一旦出个什么事我们负不起这个责。“那好，我等一会儿。”她就回去等一会儿，她有时候也通情达理。

有一次，开完会后江青特别高兴，有说有笑，眉飞色舞，说要请我们吃饭。打电话叫秘书提前安排，在17号楼放了大长桌，请了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放电影的同志，大概有十几个人，那天拿出茅台，她象征性地喝了一点儿。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做白内障复明手术，很成功，她高兴，“主席的眼睛能看见了！”她与主席还是有感情的。那天包的饺子，吃得很饱。

杨：我跟她在一起吃饭，从来没吃饱过。

姜：她要严肃起来，可不敢吃了，你不能光闷头吃，她眼一瞪就吓得你直哆嗦。

阎：别说我们了，连她留汪东兴吃饭，他都不敢和她一起吃；都是叫程师傅给做点儿，端到我们办公室吃。有一次，她吃饭时，我去向她报告一件什么事，报告完，她说：我这里还有包子，你帮我吃了吧！我说，谢谢江青同志，我不饿。

李：她还有什么高兴的事？

姜：最高兴的事就是受到主席的表扬，只要主席说看了她送的材料或是文章很好，她就高兴得不得了。“我还要看，告诉新华社，提前两个小时给我打印出清样来，我要大的，主席看得清楚。”主席一表扬她就高兴，也不找茬了，而且特别和气，也通情达理起来了，我们也跟着沾光。

杨：就是她高兴的时候，你也不能跟她开玩笑。

姜：我一开始不知道，看她高兴，就说：“江青同志，我看了一个笑话，给你讲讲。”哪知说完了以后，起反作用，引起她的疑心——本来不是那个意思，她就理解成那个意思。

李：听了那个笑话她当时就发作还是过几天再发作？

姜：当时没有，过了好几天她还琢磨这个事。“你和我说的那个笑话是怎么回事？”这也提醒我，凡是社会上的事，特别是一些不准确的事，涉及个人的一些事，千万不要给她讲。讲者无心，听者有意，她就想“是不是针对我啊”。

李：也能理解，因为政治环境太复杂了，她不能不保持灵敏的触角。

姜：当时没人跟我讲这些事。以后她散步的时候我就不再随便说话，她问到你什么事，你能说就实事求是地说，要不就打马虎眼。比如有个人呼一下跑过去了，你明明知道是谁，但不能说。她会问：“那是谁，是不是特务？”我说：“不是，就是一个人从这走过去。”她是近视眼，看不清楚，就问我：“你看清楚是谁了吗？”我说没看清，可能就是钓鱼台的工作人员吧。“哦，工作人员可以。”别人看见她都是赶紧跑，因为害怕她，她就以为是要害她，要搞她的小动作。如果你说是谁，那就完了。“他怎么这么冒冒失失的，见到我怎么这么慌慌张张的，他不适合在我这里工作，赶紧把他弄走。”

李：江青跟你发火还为什么？

姜：一般发火就是她不高兴的时候。后来我摸到规律了，她不高兴的时候，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别出声，有什么没听清，再问她一句也不要紧。

杨：他是1973年6月到她那儿的，到他离开1975年年底，这一段江青工作比较忙，她一忙起来对工作人员就比较好了，顾不上了，没有精力和你闹别扭了。而且那段时间，她也没有什么烦心事了。

姜：有一件事江青比较烦心，就是烧照片。有一天，江青想看看接待外国元首的18号楼里挂的都是什么画。我赶紧给钓鱼台管理局的局长张振良打电话，他一听说江青要到18号楼看看，就赶紧准备，把灯都打开。江青去一看，墙上都挂了些古画，其中有一张是一个猫站在一个大石头上，她说这是影射，把毛主席孤立了。然后就把新华社的杜修贤叫来，把她照的相全拿出来给钓鱼台国宾馆选，要挂在18号楼。选出来后，让杜修贤给放大，用的是柯达相纸，都是进口的，挺贵。放大后，江青看了很高兴，要求做镜框，把18号楼的古画都拿下来，挂上她的作品。挂上去的时间不长，主席听说了，他把江青叫去，让她全摘下来，新华社印了多少相片，全算账。江青说她没有那么多钱。主席说，没有从他的稿费里面出，叫吴连登给她补钱。江青特别不高兴，让我们把那些照片都弄到10号楼的天井里烧掉。我们也不敢不听，相片上面都带油，烧得吱吱啦啦的一一那都是钱啊！

还想起一件事。江青要树立中国妇女的形象，想了一个点子。她说外国的男子都是西服领带，叫国服，中国的男子也有国服，是中山服。她琢磨来琢磨去，就是中国妇女没有服装，她想为中国妇女设计一种服装，穿出去一看就知道是中国妇女。有人提出中国有旗袍，她说旗袍是满族人的服装，不是中国的服装。她把这事交给天津市委副书记王曼恬。王曼恬就成立了一个班子，把中国历朝历代的服装样式都找出来，最后设计出来，大斜领，旁边系扣，达到膝盖以下，像连衣裙。她一看还行，不难看，就叫王曼恬做一批，先叫大会堂的服务员穿。后来一到大会堂开会，她们就说我们穿的是江青服，叫布拉吉。但她们又反映干活不方便，穿的时候也不太方便。后来不了了之，也没推广。

李：当时做这个服装的时候你在？

姜：在。当时她还有假发。她怕风，有时候大会堂里的风她也受不了。在外面她可以戴帽子，大会堂一般都是进屋要脱帽，戴着帽子不太礼貌。她跟王曼恬商量，能不能给我一个类似帽子又不是帽子，在室内可以戴的，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王曼恬就想了一个办法，做了一个假头套。

杨：戴过吗？

姜：就看了看，没怎么戴。现在社会上传的江青没有头发，假头发，假乳房，假屁股，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李：除了安排工作，江青平时跟你聊点儿家常吗？

姜：有时候说点儿。

“我是一个很受苦的孩子，我从小就跟着我妈妈。”她说，“我爸爸很厉害，还打我妈妈，有时候打我，我母亲把我搂到怀里，他还打，往死里打。”她妈为了她离开了她父亲。“小时上学的时候，我没有吃的，跟父亲要两个铜板买个烧饼来充饥。”她说，“我父亲过去是一个开木匠铺的，专门做大车轮子。”她问我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现在农村有的地方还有这样的木匠铺。

后来她说到茉莉花，她说她对茉莉花很感兴趣。1972年在广州小岛，路两旁都是茉莉花，她弄了一大堆，还挂了一串在脖子上，又叫拿到香港去卖。她说：“我为什么喜欢茉莉花呢，它虽然小但香味很大，过去我父亲开木匠铺的时候，冬天有几盆茉莉花摆在炉子旁边，开的花我特别喜欢。”我平时没有机会接触她，一般就是散步的时候说几句，她说你听。她一讲你就不用怕了，因为她集中精力给你讲这些事，什么风就不管了，只要她一聊天就不会批评你了。

李：听说看电影是江青每天不可少的活动，请你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姜：我在的时候，江青看电影不多，她对电影很挑剔，血腥的不看，有床上镜头的不看。日本拍的《精武门》有一段比较暴露的表演，江青告诉放映员：“你给我把那段镜头挡起来。自然主义的给我挡起来。”江青自己拥有500多部电影，就放在17号楼的地下室。有几部电影她反复地看，《红菱艳》《红与黑》，她能看进去，我要看几遍的话就厌烦了。她说：“《红与黑》心理描述得特别细，话还少，不像好多我们自己拍的电影全是说话。”“把第三本和第四本给我放一放，那个情节好。”

杨：《红菱艳》那个男主角用拳头把玻璃打碎的那个镜头，她特别愿意看，不知看了多少次。

李：她看国产片多不多？比如《春苗》《红雨》《海霞》《闪闪的红星》《南海长城》之类的？

姜：国产片看得不多，那时候也少，《春苗》《南海长城》《海霞》看过，《闪闪的红星》看得多，那个演得好，她还指导过，把哪个镜头应该去掉，添什么。《白毛女》等样板戏她可下功夫了，说要挂个小辣椒、挂个玉米棒子等做道具，等等。

李：苏联电影和港台电影看吗？

姜：苏联电影没有，港台电影到广州看的多，都是从香港调几部片子来看。

李：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离开她，往往都是磕磕绊绊的，有的甚至是被江青捏造莫须有的罪名赶出来的，听说你离开江青是平平安安的？

姜：我老婆1976年年初要生孩子，我就提前报告了江青。一次散步的时候，我说江青同志，我有个事想报告您一下。“什么事，你说吧。”我家属要生孩子了。“生孩子！什么时候生啊？”我说预产期是1976年1月份。她一听，“生孩子是个大事啊！她现在在哪儿？”住在

北京。“哎呀，那可不行啊。老家好，老家有老人侍候，老人有经验，你应该把她送回去，叫你的母亲侍候她，在家里生，不能在这生，你没有经验。”我说，现在肚子挺大的，坐车挺麻烦，上千里地，我家在山东，得从天津坐船，再坐车，很危险。“危险？你早干什么了，你早不把她送回去？”这时候就到了17号楼了，她不说了，我也不吭声了，她就进去打牌了。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散步的时候她说：“你老婆生孩子可是大事，既然不能回去了，那你就侍候几天吧！”还不错，叫我离开侍候几天。“你侍候你老婆生孩子，但是我这里有什么事，你要随时来。”她想起了要周金铭来替我，可能周金铭在被江青赶走后见过江青。

杨：那是金日成访问中国，到了北京火车站，中央领导去接站，江青也去了，警卫科要到车站去执行警卫工作，江青就见着了大周。

姜：好像在钓鱼台江青还让大周去了一趟，这时候正好我也提出这个事。她说：“那你走吧，叫大周来。”我心想太好了！没犯什么大错误，没被打成反革命。我就赶紧打电话给警卫科，把大周叫来。

临走的时候，趁她要出门散步，我在门口等着她，告诉她，江青同志，大周来了，我也可以离开了吧？“那你走吧，我这有事，要随时能找到你。”我就伸出两个手跟她握手说：“江青同志，您多保重！”心想真是谢天谢地，我可以离开了！

李：从你提出到离开，一两天的时间？

姜：一两天的时间，她琢磨了半天才同意。然后我就离开了，回二科了。之后我只是有时候值班时跟过她的随车。

杨：关于大周回去，我补充一下。刘玉庭生前跟我说过：“大周回去以后，江青就问大周：‘小杨回来了吗，他在哪呢？’”大周说：“回来了，他在警卫团。”江青说：“叫他也回来吧，小杨在我这里时间比你还长呢，他更了解我，叫他也回来吧！”汪主任就找我谈话叫我回去，我说：“汪主任，我死活不回去了。”他说：“我怎么跟她说啊？”我说你这样说：“你知道他心脏不好，他的身体已经不能适应在你这里工作了，你工作那么重要，就不要叫他回来了吧！”汪跟江青这样一说，江青说：“行啊，小杨心脏不好，就不要回来了，部队工作也挺累的，叫他转业吧，照顾他一下，转到北京不要转到地方。”汪东兴说：“你转业吗，转业的话我给你安排。”我说我不转业，我在部队这么多年了，轻车熟路。“那就好好干吧！”我没回去，真是万幸。

李：您回到了警卫二科，对抓“四人帮”的事，事先知道吗？

姜：我不知道。1976年10月6日晚上抓“四人帮”的时候，我们二科一部分同志在中南海。领导说今天要开会，让我们在车上等着，等了好久也没让出来，后来跟我们说你们回去吧，任务已经完成了。回去以后我们才看到一个车队，全是红旗车（那时候安排了好几个车队呢），在东西长安街、中南海来回进出。那时候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但是看这个情况特别紧张。

李：你什么时候知道那天抓的有江青？

姜：那时候光听到一句，可能中央发生大事了。但是我们只是看车辆来回跑，那个气氛不对，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刚去世，还不到一个月，正是全国紧张的时候，但具体的那些事，是后来才听说的。

我们回去以后就看不到他们了。因为他们都住在钓鱼台，王洪文在16号楼，张春桥和姚文元在9号楼，看不到影儿了，江青当时住中南海201。后来，他们的警卫员统统集中起来了，这个我们知道，常本耀（王洪文的警卫员）、王世柯（张春桥的警卫员）、朱胜利（姚文元的警卫员），原来吃饭还在一个饭堂里，现在看不见了。我们从侧面了解，说是在花园村，在集中办学习班，这才知道“四人帮”已经抓起来了。至于怎么抓的，中央怎么部署的这个我们不知道。

李：当你知道江青抓起来以后心情怎么样？

姜：我们想这下可解放了，我们完成任务了，心情就像解放了一样，很高兴。1977年把我弄到江西“五七”干校。所有“四人帮”的警卫员都在“五七”干校。当时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去以后，劳动改造，干部轮训。干一年。在干活中‘过筛子’。”所谓“过筛子”就是检查检查自己有没有问题。

李：“过筛子”怎么给你过的？

姜：重点就是那几个，朱胜利、王世柯、常本耀。“五七”干校的连长、指导员当时说，给在“四人帮”身边工作过的人开会，“你们背着党、背着组织干过什么事，一事一议，有什么事交代什么事”。我想来想去没有啊？

李：一般人评价江青，是一个政治符号，是左啊右啊，革命啊反动啊，你作为一个身边人，觉得这个人有没有我们平常所说的妻子、母亲、女儿、姐妹以至朋友那样的亲情？

姜：我看她亲情不多，爱情也说不上，她经常说：我和主席是政治夫妻。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就在北京，而且姐姐还是帮她把孩子拉扯大的，自从离开中南海后，似乎从来没有来往过，姐姐来了不少信，她一封信也没回过。她和自己的女儿经常吵，李敏不是她生的，更是冷若冰霜。她同父异母哥哥和侄子来北京勉强见了一面。李讷生的是她的亲外孙，从来没抱过一下。

当然，我说她“亲情不多”，不是说她一点儿亲情也没有。记得我刚做警卫员不久，有一次主席让秘书打电话给江青，说李讷住在玉泉山，听说病得很重，我去不方便，你去代表我看看她。那次我跟着江青去了。李讷住在玉泉山一号楼，当时的确病得很重。江青从那里出来一声不吭，也没掉眼泪。路上我问她到哪里去，她说：“到主席那儿去。”随车有电台，我就给主席值班室联系，主席那时候刚睡觉起来，同意了。她进去了，我们在外面等着，张玉凤也进去了。我后来听张玉凤说，到了主席那江青哭了，说：“主席啊，咱就这么一个女儿，你赶紧救救孩子！不行啦！”以后成立了一个医疗班子，专门给李讷看病，她才逐渐康复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有时候她还是亲情的。

李：这就是母女天性。江青像这样的真情流露，哪怕只有一次，也应当记录下来，这才是鲜活而丰富的历史人物。

反过来看，一般的人不管怎么忙革命、工作、事业，总得有点家庭生活，江青几乎没有，这是为什么？

姜：毛主席住在中南海，她住在钓鱼台，见面还得请示。毛主席的那些亲属，岸青、邵华，不管怎么样，都是家人，应该在一起说说话啊什么的，但她从来不见他们。

杨：我看老阎的文章上面有一句话：“你到我这儿来工作就是为我服务，到我这来以后不能

接受别人的任务，别人不能再叫你办事了，为我服务就是为党服务。”你走了以后她这话跟我也说过。

阎：那段话是我刚去不久时她说的，这是她和我第一次正式谈话。其过程是这样的：戚本禹1967年2月份叫我到中办秘书局了解情况，那确实是有他的想法的，当时他很想管秘书局的事情，但又没有什么名义，因为我已是江青的秘书，他希望通过我让江青说句话：“这件事请本禹同志去处理。”江青清楚这件事情不是我主动去的，而是别人派我去的，这“别人”江青一定猜到了就是戚本禹。所以江青在收到我给她写的报告时，马上找我谈话，郑重地告诉我：“这件事你不要去管了；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任何人不能再派你工作任务，这是纪律，我们都是党员，你要对我负责，对党负责。”我觉得她说得很在理，我诚恳地向她表示：“江青同志，我一定照您说的去做。”我是一个老实人、守纪律的人，当时我马上去告诉了戚本禹和关锋。我跟戚本禹说时，戚还说：“好，以后你动嘴（指传达江青的指示），我跑腿。”这一点，我在给江青做秘书时，是严格做到了的。

杨：老阎讲这个问题，对我很有启发。有一部电影叫《一仆二主》，江青指名叫我看，说她中午休息，要我看《一仆二主》，意思很明显，是警告我不要“一仆二主”。

李：江青这个人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她从反抗压迫始，以压迫他人终；从娜拉、繁漪那样追求个性解放出发，到投身灭绝人性的“文革”，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这很值得考察和研究。

谢谢姜老的讲述！

谢谢阎老、杨老的参与！

□ 《百年潮》 2014年第4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